

歐蘇散文創作與接受活動的 考察

王基倫*

提要

由唐入宋的散文創作與接受活動的過程中，歐陽脩、蘇軾二人實居關鍵影響地位。本文即以二人的創作成績及文本的接受活動作為討論對象，澄清其散文創作的效果、闡釋與影響。

研究過程得知，歐陽脩仕途平順，性情和易清簡，加上「事信言文」的文學主張，抒發出平易近人的寫作風格。蘇軾宦途險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巖，促成晚年生命層境愈趨通透，文筆趨於純熟，超凡而脫俗。一常在朝，一常在野，而人品高潔，皆能樹立當代文士的典範。

從接受史的角度看來，歐陽脩經過「由奇而常」的努力，確立了唐宋散文的分野。蘇軾的影響力也與日俱增。這原因來自多方面：一是蘇軾自身的創作經歷；二是他擴大了文學範圍的解釋，追求「意」的呈現；三是仕宦遊歷，飄泊南北，既擴大了空間版圖，也受到朝廷皇帝的同情目光。眾人都成了蘇文的讀者。

儘管如此，蘇軾大名終未掩蓋歐陽脩，歐、蘇二人也沒有競勝高下之爭。蘇軾始終尊歐，當為關鍵因素。

關鍵詞

歐陽脩、蘇軾、散文創作、接受活動

歐蘇散文創作與接受活動的 考察

一、前言

北宋中期歐陽脩(1007—1072)所領導的古文運動，上承唐代韓(愈，768—824)、柳(宗元，773—819)之文風，下啓三蘇(洵，1009—1066、軾，1036—1101、轍，1038—1112)、曾(鞏，1019-1083)、王(安石，1021—1086)乃至後世散文寫作之新機運，其影響可謂深遠。這一段由唐入宋的散文創作與接受活動的過程中，歐(陽脩)、蘇(軾)二人實居關鍵影響地位。文學史上並稱「歐蘇」，一如「韓柳」、「蘇黃(庭堅，1045—1105)」者，皆是對其文學地位之肯定，其中含有肯定二人之關聯性，如「韓柳」、「歐蘇」並稱之重點在文不在詩，「蘇黃」並稱之重點在詩不在文。不過，合稱其名也往往引發後人加以比較，如歐陽脩即認為「柳不及韓」，¹韓柳爲文競勝、二人高下相爭的說法也一直爭論不休；²「蘇

¹ 歐陽脩〈唐南嶽彌陁和尚碑〉：「自唐以來，言文章者惟韓、柳，柳豈韓之徒哉？真韓門之罪人也。」《歐陽文忠公文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正編，1979年11月），卷141《集古錄跋尾》卷8，

黃」齊名也是引發後世爭論的議題。³倒是「歐蘇」相提並論，文名益高，⁴始終沒有競勝高下之爭，令人好奇「歐蘇」二人同時或其後，世人為何少有評比，原因何在？究竟二人對當代散文創作的影響孰大？

本文僅以北宋中後期為討論的對象，⁵這是因為歐蘇二人已是北宋中期的人物，當時進入文風鼎盛的階段，大量的文集、詩話、筆記小說資料，正可視為深具接受意義的文本，最能提供我們瞭解二人對古文運動的直接影響。借鑒歐、蘇文本的接受活動，可以考察其創作態度之歧異，包括文學主張、寫作歷程、文體選擇影響了哪些讀者？北宋文人對歐、蘇的接受現象和審美反應為何？這都有助於澄清散文創作的效果、闡釋、影響。綜合上述努力，可望對二人之影響力重新詮釋，建構起北宋散文的接受史意義。

頁 1127。以下簡稱《歐集》。

- ² 歷代對韓、柳二人的評價頗為紛歧，有揚韓抑柳者，如宋祁(998—1061)、歐陽脩、李塗(約 1147 前後)、茅坤(1512—1601)、方苞(1668—1749)、姚鼐(1732—1815)，有揚柳或揚柳抑韓者，如晏殊(991—1055)、范仲淹(989—1052)、李贄(1527—1602)、陳衍、章士釗等；今人討論文章亦屢見不鮮，如羅聯添(1927—)，〈論韓愈古文幾個問題〉論及「韓柳為文相角」，《漢學研究》第 9 卷第 2 期，1991 年 12 月，頁 294—302；又如吳小林，〈韓愈柳宗元散文比較〉，收入氏著：《唐宋八大家》(台北：里仁書局，1999 年 12 月)，頁 159—180。
- ³ 曾棗莊(1937—)，〈評蘇黃爭名說〉，收入氏著，《唐宋文學研究》(成都：巴蜀書社，1999 年 10 月)，頁 129—144。
- ⁴ 呂本中(約 1119 前後)《紫薇詩話》載潘邠老(大臨，約 1090 前後)〈哭東坡絕句十二首〉云：「公與文忠總遇讒，讒人有口直須緘。聲名百世誰常在？公與文忠北斗南。」引自何文煥編：《歷代詩話》(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 年 2 月)，上冊，頁 374。
- ⁵ 此處北宋的分期，採用張其凡〈論宋代政治史的分期〉的說法，以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為前期(960—1022)，以仁宗、英宗兩朝為中期(1023—1067)，以神宗、哲宗、徽宗、欽宗四朝為後期(1068—1127)，收入氏著，《宋初政治探研》(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5 年 10 月)，頁 1—9。

二、盟主地位的接受

一般《中國文學史》推尊歐陽脩能文愛士，身居要津，拔擢曾鞏、王安石、三蘇父子，領導宋代古文運動終底於成；然而，詩話、筆記小說卻大量記載蘇軾事蹟遠多於歐陽脩，⁶又對蘇軾詩、詞、散文、書畫各方面的藝術成就多所肯定，且「蘇門六君子」後繼有人，⁷影響北宋文壇可能更為深遠。如果學者由此提出懷疑，認為蘇軾影響力高過歐陽脩，亦合乎情理。

然而，從時間條件、因果條件上來說，歐陽脩的年齡較長，又是北宋古文運動領導者，更在嘉祐二年(1057)知貢舉期間親手拔擢蘇軾，自然深深影響到蘇軾的文學創作。更重要的是，蘇軾始終尊歐，他在序歐陽脩《居士集》說道：

……(韓)愈之後二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軻，前 372—前 289)以達於孔氏(丘，前 551—前 478)，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

⁶ 以常振國、降雲編《歷代詩話論作家》為例，該書搜集眾多詩話作品討論歐陽脩的資料，自《臨漢居詩話》至《藝苑雌黃》，凡 101 則；而搜集詩話討論蘇軾的資料，自《冷齋夜話》至《詩學規範》，凡 488 則；足見後人談論蘇軾的情形勝過歐陽脩。參見氏著，《歷代詩話論作家》(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93 年 9 月)，第 2 冊〈歐陽脩〉、〈蘇軾〉，頁 226—248、312—404。

⁷ 「蘇門六君子」指黃庭堅、秦觀(1049—1100)、晁補之(1053—1110)、張耒(1054—1114)、陳師道(1053—1101)、李廌(1059—1109)最負盛名的六人。蘇軾〈答張文潛(耒)縣丞書〉曾說：「僕老矣，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者，正賴黃魯直(庭堅)、秦少游(觀)、晁無咎(補之)、陳履常(師道)與君數人耳。」《蘇軾文集》(孔凡禮典校，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 3 月)，卷 49，頁 1427。以下簡稱《蘇集》。可見蘇軾古道之學的傳人，在此數人身上。彼等古文藝術成就，參見郭預衡，《中國散文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中冊，第 5 編第 8 章第 1、2 節〈蘇門後學之文〉(一)(二)，頁 543—566。

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1023—1031)、景祐(1034—1037)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說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1056—1063)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754—805)，記事似司馬遷(前145—約前86)，詩賦似李白(701—762)。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⁸

這篇文章作於「歐陽子沒十有餘年」⁹(約1082之後)，實有其寫作背景。一方面對應於當代道學思想之興起，肯定歐陽脩「通經學古」，已能繼承孔孟大道；另一方面也肯定他能拔擢人才，造成文風改革的成功；¹⁰這裡也指出，他的人品影響到當代風氣，表現於當代議論文氣之增強。此外，蘇軾提出「歐陽子今之韓愈也」的說法，實有意接續韓愈結合道統與文統的作風。韓愈〈原道〉揭櫫「道統說」，¹¹一方面也提出了一個「尊經重散」的「文統說」，

⁸ 蘇軾，〈六一居士集敘〉，《蘇集》，卷10，頁316。

⁹ 同前註。

¹⁰ 歐陽脩〈條約舉人懷挾文字劄子〉提出錄取文士的標準是：「務通經術，多作古文。」《歐集》，卷111《奏議集》卷15，頁850。此外，惠洪(1071—1128)《冷齋夜話》卷2說：「歐陽文忠喜士為天下第一，嘗好誦孔北海(融，153—208)『坐上客常滿，杯中酒不空。』」引自洪本健(1945—)編，《歐陽脩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5月)，上冊，頁159。有關歐陽脩知貢舉期間的考試政策，參考金中樞：《宋代學術思想研究》(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9年3月)，第3章〈宋代古文運動之發展研究〉，頁181—253；包弼德(Peter K. Bol)著、劉寧譯，《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6章〈歐陽脩在他的成熟階段〉一節，頁199—210。

¹¹ 韓愈〈原道〉，《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朱熹(1130—1200)校，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正編，1979年11月)，卷11，頁96—97。

正因為他身兼道統與文統，故深獲世人敬重。¹²蘇軾勾勒歐陽脩的文章美學意蘊之餘，不忘提出韓、歐一脈相承的說法，確立了歐陽脩的地位及其影響之深遠。

蘇軾對歐陽脩的禮敬，除了在他的書信、評論文字對歐公贊譽得無以復加，毫無貶損之意外，也從他的交遊往還看得出來。例如神宗熙寧四年(1071)，蘇軾自請外放，被任命為杭州通判時，他離京南下，先到陳州(今河南省淮陽市)探望弟弟蘇轍，兄弟二人再同往潁州(今安徽省阜陽市)拜謁歐陽脩，此時歐已歸養潁州，年六十五，自號「六一居士」。歐是蘇氏兄弟的門師，三人皆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合而離京去職，又成為政治上的同道，於是蘇氏兄弟此行是感懷知遇之恩，也有拜見請安的情意。這份情意，終老不衰。次年(1072)蘇軾作〈祭歐陽文忠公文〉寫道：「斯文有傳，學者有師」，¹³筆端飽富情感，內心深處的悲慟彷彿師生情誼深厚的無限延伸。

再者，歐陽脩「未嘗矜大所為文」，¹⁴反而能提拔後進，也很能欣賞蘇軾，打從身為主考官，錄取蘇軾為第二名開始。哲宗元祐五年(1090)蘇軾作〈太息一首送秦少章(觀，觀之弟)秀才〉說：「昔吾舉進士，試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¹⁵楊萬里(1127—1206)《誠齋詩話》記載當時歐公讀到蘇軾〈刑賞忠厚之至論〉一文，驚喜萬分，事後詢問東坡典故出處，知其無中生有，大驚曰：「此人可謂善讀書，善用書，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¹⁶邵博(約 1122 前後)《邵氏聞見後錄》也

以下簡稱《韓集》。

¹²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台北：華正書局，1996年7月)，第17章2〈宋代的古文運動〉，頁588。

¹³ 蘇軾，〈祭歐陽文忠公文〉，《蘇集》，卷63，頁1937。

¹⁴ 出自葉夢得(1077—1148)《石林詩話》卷中載歐陽棐(歐陽脩之子)之言。引自何文煥編，《歷代詩話》，上冊，頁424。

¹⁵ 《蘇集》，卷64，頁1979。

¹⁶ 引自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台北：木鐸出版社，1988年7月)，上冊，頁148—149。其中提及蘇軾〈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一文，參見《蘇集》，卷2，頁33—34。

說：「歐陽公……謂梅聖俞(堯臣，1002—1060)云：『讀蘇軾書，不覺汗出，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又曰：『軾所言樂，乃脩所得深者爾，不意後生達斯理也。』歐陽公初接二公(王安石、蘇軾)之意已不同矣。」¹⁷葛立方(?—1164)《韻語陽秋》也有類似記載。¹⁸朱弁(1085—1144)《曲洧舊聞》卷八也說：「東坡詩文，落筆輒爲人所傳誦。每一篇到，歐陽公爲終日喜，前後類如此。一日，與棗論文及東坡，歎曰：『汝記吾言，三十年後，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¹⁹上述四則筆記，皆未偏離蘇軾自家的說法，亦非孤證，可見故事流傳久遠，深入人心。宋人多肯定歐陽脩能發掘人才、獎譽人才，日後蘇軾的表現，也不負歐公先見之明的厚望。

歐陽脩的文壇盟主地位，²⁰蘇軾心嚮往之，在某些時候，也不諱言以繼承其位爲己任。蘇軾〈太息一首送秦少章秀才〉一文，力主歐陽脩的名聲高過那些責難他的人，而自己也是歐的繼承者：「自視缺然，而天下士不吾棄，以爲可以與於斯文者，猶以文忠公之故也。」²¹此等自白，有飲水思源之意。同時期他的追隨者李廌也記述道：

東坡嘗言，文章之任亦在名世之士相與主盟，則其道不墜。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輩出，要使一時之文有所宗主。

¹⁷ 邵博，《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台北：廣文書局)，卷14，頁2b。

¹⁸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18說：「王介甫(安石)、蘇子瞻(軾)皆爲歐陽文忠公所收，公一見二人，便知其他日不在人下。……子瞻登乙科，以書謝歐公，歐公語梅聖俞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當是時，二人俱未有聲，而公知之於未遇之時，如此所以爲一世文宗也與？」引自何文煥編，《歷代詩話》，下冊，頁629。

¹⁹ 此條亦見於朱弁《風月堂詩話》卷上。此處《曲洧舊聞》卷8之言，引自洪本健編，《歐陽脩資料彙編》，上冊，頁197。

²⁰ 朱弁《風月堂詩話》卷上說：「歐公爲文章宗師。」陳郁(約1253前後)《藏一話腴》甲集卷下說：「歐公，宋文章之師，故蘇子美(舜欽，1008—1048)、梅聖俞爲之徒。」引自洪本健編，《歐陽脩資料彙編》，上冊，頁198、390。

²¹ 同註15。

昔歐陽文忠常以是任付與某，故不敢不勉，異時文章盟主，貴在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²²

這段話若屬實，則透露不少訊息。首先，歐、蘇二人都有「需要文章盟主」的想法，傳文章即所以傳道。其次，歐陽脩已穩居盟主的地位，才能有傳位給誰的考量，而他屬意的對象是蘇軾。再其次，蘇軾不認為這是一個「位」，而是一種「責任」，心中已接下此一重責大任，不過，他沒有指定繼承人。這則資料結合前述蘇軾讚美「歐陽脩兼備道統與文統」的說法觀之，北宋古文運動在歐、蘇身上薪火相傳，那是以「文道合一」的理念對抗道學家的勢力。²³然而，蘇軾若真有接下盟主「大位」的考量，恐怕還有另一個重要因素：反對王安石領導文壇。²⁴就後來的發展看來，蘇軾學得歐陽脩獎譽人才的作風，²⁵環繞在他周圍的文士頗多，這是繼歐公之後另一次文人「群英會」，他在文壇上領導地位也因之屹立不搖。

²² 李廌，《師友談記》，引自四川大學中文系唐宋文學研究室編：《蘇軾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4月），上編1，頁89。

²³ 當時有文學家與道學家二大勢力的角力活動，爭執焦點在於文學家能否傳道？例如提倡道學的胡宏（1105—1155）〈程子雅言前序〉就認為傳統學術將絕，能傳承斯文者，不是王安石、歐陽脩或蘇軾，而是程氏兄弟（顯，1032—1085；頤，1033—1107）。他說：「王氏支離。支離者，不得其全也。……歐陽氏淺于經。淺于經者，不得其精也。……蘇氏縱橫。縱橫者，不得其雅也。……」可見有些道學家認為文學寫作者難以繼承傳統學術。參見胡宏，《胡宏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6月），頁156—158。

²⁴ 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說：「王安石在《字說》的序言中聲稱上天通過他拯救斯文，蘇軾向這個說法提出挑戰。歐陽脩、王安石和蘇軾聲稱自己承遞斯文，也就是擁有道德權威，因為這就是聲明自己於斯文的用意所在。」參見該書第8章〈蘇軾的道：盡個性而求整體〉，頁269。

²⁵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1說：「東坡喜獎與後進，有一言之善，則極口褒賞，使其有聞於世而後已。故受其獎者，亦踴躍自勉，樂於修進，而終為令器。若東坡者，其有功於斯文哉？其有功於斯人哉！」引自何文煥編，《歷代詩話》，下冊，頁489。

三、創作生命層境的提升

宋代古文運動的寫作者，延續晚唐韓文「重道」與「尚奇」兩條途徑，構成了當時學寫古文的兩大路線之爭。稍早之時，柳開(947—1000)、穆脩(979—1032)反對「西崑體」的作風；王禹偁(954—1001)等人反對晚唐晦澀風格，逐漸轉向平易近人的書寫方式，皆為歐陽脩所接受。²⁶

於是歐陽脩知貢舉時，打擊「太學體」，排抑古文寫作過程中險怪奇澀的文風。²⁷這期間他提倡尊韓，領導文士步趨韓文，大量書寫古文作品，使之成爲一種風尚。然而歐文風格又不似韓文，一方面是他改變了韓文「尚奇」的特點，側重「重道」，在六經精義中找尋「能樹立經時不移的『常』，……在他的文學理論和實踐中體現由『奇』而『常』的轉化。」²⁸另一方面是他強調道的同時，更重視「事」的要求，〈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說：「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²⁹歐去世後，蘇軾繼承了歐文「重道」的特點，又將「道」擴大到「藝」的解釋，開展出「意一法一工」三段文道論，由此而有文意「脫

²⁶ 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上云：「歐陽文忠公詩始矯『崑體』，專以氣格爲主，故其言多平易疏暢。」引自何文煥編，《歷代詩話》，上冊，頁407。有關歐陽脩對王禹偁等人的接受，可參考王基倫(1958-)，〈韓愈散文的讀者接受意義—中晚唐至北宋中期的考察〉，《唐宋古文論集》(台北：里仁書局，2001年10月)，頁21—69。

²⁷ 沈括(1031—1095)，《夢溪筆談》載：「嘉祐中，士人劉幾，累爲國學第一人，驟爲怪嶮之語，學者翕然效之，遂成風俗。歐陽公深惡之。會公主文，決意痛懲，凡爲新文者，一切棄黜。時體爲之一變，歐陽之功也。」沈括著、胡道靜校注，《元刊夢溪筆談及新校注合刊》，台北：鼎文書局，1977年9月)，卷9，頁4b。

²⁸ 陳幼石，《韓柳歐蘇古文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年5月)，第3章〈歐陽脩的文學理論與實踐〉1，頁86。

²⁹ 《歐集》，卷67《居士外集》卷17，頁504—505。

凡超俗」，又不否認「新」、「奇」、「高」、「華」爲工的表現形式。³⁰他也重視「事」，〈與王庠書〉直陳「儒者之病，多空言而少實用」，³¹到了晚年，蘇軾也反對「時文」，但他在〈答張文潛縣丞書〉提出來的是：「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於王氏（王安石）。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己。……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³²所反對的是王安石鼓動而成的文風。蘇軾繼承歐陽脩的某些觀點，振興古文的初衷未曾改變，只是遷就時局變遷而努力方向有所不同。

歐、蘇之間關係密切，其文學觀念理應十分相近，然而終究存在不少差異。郭紹虞(1893—1984)《中國文學批評史》說：

三蘇論文便與歐(陽脩)曾(鞏)迥異。其所由不同之故，即在其對文學的態度。……蓋道學家及柳(開)穆(脩)歐曾諸人，其所以學古人之文者，乃所以求其道，即使於道無所得，表面上總不敢像蘇洵這樣大膽地宣言為文而學文。……所以孔孟荀(況，約前 315—約前 236)揚(雄，前 53—18)韓(愈)諸人在道學家以之建立道統者，在他(蘇洵)卻以之建立文統。……他只是論文的風格，不復論及文的內容。……這便是三蘇論文重要的地方。明此，才可知三蘇論文，本不重在道。即偶有言及道者，其所謂道，也是道其所道；非惟不是道學家之所謂道，抑且不是柳穆歐曾諸人之所謂道。……東坡之所謂「道」，其性質蓋通於藝，較之道學家之所謂道，更為通脫透達而微妙。³³

³⁰ 陳幼石，《韓柳歐蘇古文論》，第4章〈蘇軾文學理論中的『變』和『常』—兼論《赤壁賦》〉頁106—123。

³¹ 《蘇集》，卷49，頁1422。

³² 《蘇集》，卷49，頁1427。

³³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4月)，上卷第6篇第1章第3節第3目〈三蘇〉，頁339—342。其中稱引蘇洵的言論，出自蘇洵〈上歐陽內翰第一書〉，《嘉祐集》(台北：台

這裡把道學家與早期古文家的思想觀念畫上等號，認為他們是在「文以載道」，因而是在建立「道統」；而三蘇以後是「為文而學文」，即使論「道」，也已經擴大了「道」的解釋，更專著於文藝，因而是在建立「文統」。當我們檢視歐、蘇二人的文學主張和實際創作情形時，也會發覺此一說法可從。在歐陽脩方面，他的〈答吳充秀才書〉說：「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³⁴〈送徐無黨南歸序〉鼓勵學者首重修之於身，次則施之於事，而較不重視見之於言；³⁵〈答祖擇之書〉也說：「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為文者輝光。」³⁶這些言論都在闡述「重道勝於重文」的傳統觀點，與儒家「有德者必有言」³⁷的說法相似。在此背景下，「歐陽脩提出的不少文學理論概念，例如『信』、『簡』、『常』等都可以看作是與唐代古文傳統相成相正的，……歐陽脩古文文論中心論點是他的『信』的觀念。『信』在歐陽脩的文論中有兩個方面的意義，即它在文學中的立足點以及『信』本身作為一種道德價值的立足點(理論據點)。歐陽脩在很多文章中都把『信』作為一個價值標準。見〈正統論〉、〈春秋論〉、〈魏梁解〉、〈易或問〉、〈內殿崇班薛君墓表〉、〈與樂秀才第一書〉、〈與張秀才第二書〉等。」³⁸循

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正編，1979年11月)，卷11，頁42。

³⁴ 《歐集》，卷47《居士集》卷47，頁343。

³⁵ 《歐集》，卷43《居士集》卷43，頁320。

³⁶ 《歐集》，卷68《居士外集》卷18，頁516。

³⁷ 《論語·憲問》，參見《四書章句集注》(朱熹注，台北：鵝湖出版社，1984年9月)，《論語集注》卷7，頁149。

³⁸ 陳幼石，《韓柳歐蘇古文論》，第3章〈歐陽脩的文學理論與實踐〉2，頁89。其中〈正統論三首〉出自《歐集》，卷16《居士集》卷16，頁143-148；〈春秋論〉上、中、下三篇，出自《歐集》，卷18《居士集》卷18，頁158-161；〈魏梁解〉出自《歐集》，卷17《居士集》卷17，頁153；〈易或問三首〉出自《歐集》，卷18《居士集》卷18，頁156-158；〈易或問〉又出自《歐集》，卷60《居士外集》卷10，頁449-451；〈內殿崇班薛君墓表〉出自《歐集》，卷24《居士集》卷24，頁197；〈與樂秀才第一書〉出自《歐集》，卷69《居

此理論據點而作文，基本上恆有一「信實可徵」的寫作態度，出發點常會考慮到道德價值問題。我們可以拿柳宗元貶官永州(805)後所作的〈懲咎賦〉、〈永州八記〉、〈愚溪對〉、〈囚山賦〉³⁹和歐陽脩貶官滁州(1045)後所作的〈醉翁亭記〉、〈豐樂亭記〉⁴⁰比較，會發覺柳宗元訴求的是個人的牢騷滿腹，歐陽脩念茲在茲的卻是「與民同樂」、「宣上恩德」的官箴職守。後者來自儒家之道的責任感遠勝於個人生命的感受。

到了蘇軾，改口強調「道可致而不可求」，意即學者所追求的工夫，在於平日的學養，「何嘗臨文時纔去討箇道來入放裏面呢？」⁴¹至於〈南行前集敘〉則說：「山川之有雲霧，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鬱，而見於外。……自少聞家君(蘇洵)之論文，以為古之聖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⁴²這裡強調心有所感，而後外發成文，雖聖人亦不例外；文學創作有時源自外在物色的引發，不必為道服務，顯然他已脫離「道勝於文」的傳統，更關注於「文」的獨立價值。循此理論據點而作文，會發展出「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⁴³的寫作態度，自然會重視「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⁴⁴，而不會以背負道德價值為主要的考量。我們拿蘇軾貶官後的作品為例，神宗熙寧八年(1075)在密州作〈超然臺記〉、元豐五年(1082)

士外集》卷 19，頁 523；〈與張秀才第二書〉出自《歐集》，卷 66《居士外集》卷 16，頁 498—499。

³⁹ 柳宗元著、吳文治校，《點校本柳宗元集》(台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2年5月)，其中〈懲咎賦〉、〈囚山賦〉出自《柳集》，卷 2，頁 53—56、63—64；〈永州八記〉出自《柳集》，卷 29，頁 762—773；〈愚溪對〉出自《柳集》，卷 14，頁 357—359。以下簡稱《柳集》。

⁴⁰ 《歐集》，卷 39《居士集》卷 39，頁 298—299。

⁴¹ 語出蘇軾，〈日喻〉，及郭紹虞對此文的詮釋。參見《蘇集》，卷 64，頁 1981；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卷第 6 篇第 1 章第 3 節第 3 目〈三蘇〉，頁 342。

⁴² 《蘇集》，卷 10，頁 323。

⁴³ 蘇軾，〈文說〉，《經進東坡文集事略》(蘇軾著、郎晔選註，香港：中華書局，1979年6月)，卷 57，頁 947。

⁴⁴ 蘇軾，〈答謝民師推官書〉，《蘇集》，卷 49，頁 1418。

在黃州作〈赤壁賦〉、〈後赤壁賦〉、次年作〈記承天夜游〉、元豐七年(1084)作〈石鐘山記〉，⁴⁵發覺他的思想內容豐富多元，實不似歐陽脩僅有儒家之道的一個層面而已。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三記載了一則後人耳熟能詳的故事：「東坡在儋耳時，余三從兄諱延之，自江陰擔簦萬里，絕海往見，留一月。坡嘗誨以作文之法曰：『儋州(海南島)雖數百家之聚，州人之所須，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己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己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明事，此作文之要也。』吾兄拜其言而書諸紳。」⁴⁶蘇軾正是以「意」貫串其道，而這個「意」不拘守於儒家之道，乃散在經子史中，指一種事理而言，得「意」可以明事、可以作文的說法，對當代文人發生了作用。

歐、蘇面對的社會情境不同，落實至散文創作上，語境也大不相同。前引歐陽脩將韓文之「奇崛」轉爲歐文之「平易」，可說是唐宋散文首先看到的一大分野。呂思勉《宋代文學》形容歐陽脩的文章說：

歐公文極平易。蘇明允(洵)〈上歐公書〉謂「執事之文，紆徐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極論，而容與間易，無艱難勞苦之態。」可謂知言。今觀歐公全集，其議論之文：如〈朋黨論〉、〈為君難論〉、〈本論〉，考證之文，如〈辨易繫辭〉；皆委婉曲折，意無不達，而尤長於言情。序跋如〈蘇氏文集序〉、〈釋祕演詩集序〉，碑誌如〈瀧岡阡表〉、〈石曼卿墓表〉、〈徂徠先生墓誌銘〉，雜記如〈豐樂亭記〉、〈峴山亭記〉

⁴⁵ 〈超然臺記〉參見《蘇集》，卷 11，頁 351—352；〈赤壁賦〉、〈後赤壁賦〉，參見《蘇集》，卷 1，頁 5—8；〈記承天夜游〉，參見《蘇集》，卷 71，頁 2260；〈石鐘山記〉參見《蘇集》，卷 11，頁 370—371。

⁴⁶ 引自何文煥編，《歷代詩話》，下冊，頁 509—510。

等，皆感慨系之，所謂六一風神也。歐公文亦有以雄奇為尚者，如《五代史》中諸表志序是。然仍不失其紆徐委備之態。人之才性，固各有所宜也。⁴⁷

這裡明白指出歐文的「平易」風格，已表現於各類文體上。我們應深究的是，「紆徐委備」、「委婉曲折」的寫作技巧除了是對應當代晦澀文風而產生的舉措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什麼？恐怕更重要的是得自於「才性」、「長於言情」，而後才能出現「六一風神」。歐陽脩從「重道」、「事信言文」到「平易近人」的文風，一貫如此表現的重要關鍵在於「性情」。歐陽脩原有「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⁴⁸然而剛而不怒，威而不猛，常以「清簡和易」的人生態度處世及寫作文章。如仁宗慶曆五年(1045)被貶知滁州後，曾藉身邊景物抒發牢騷而作〈啼鳥〉詩。⁴⁹好友梅堯臣隨即〈和歐陽永叔啼鳥十八韻〉，勸他放開心懷，對遭誣被貶之事釋懷。⁵⁰歐陽脩接受勸勉，從此不再沉溺於自怨自艾的氛圍，詩文

⁴⁷ 呂思勉，《宋代文學》(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9年)，第2章〈宋代之古文〉，頁14。其中稱引蘇洵的言論，出自蘇洵〈上歐陽內翰第一書〉，出處同註33。呂本中《童蒙詩訓》也說：「文章紆餘委曲，說盡事理，惟歐陽公得之。」引自洪本健編，《歐陽脩資料彙編》，上冊，頁194。其中〈朋黨論〉、〈為君難論〉、〈本論〉出自《歐集》，卷17《居士集》卷17，頁152-153、153-156、149-152；〈蘇氏文集序〉、〈釋祕演詩集序〉出自《歐集》，卷41《居士集》卷41，頁310-311、307-308；〈瀧岡阡表〉出自《歐集》，卷25《居士集》卷25，頁205-207；〈石曼卿墓表〉出自《歐集》，卷24《居士集》卷24，頁195-196；〈徂徠石先生(介，1005-1045)墓誌銘〉，出自《歐集》，卷34《居士集》卷34，頁264-265；〈豐樂亭記〉，出處同註40；〈峴山亭記〉出自《歐集》，卷40《居士集》卷40，頁305-306。另可參考歐陽脩《新五代史》(台北：鼎文書局，1978年9月)，卷58-60〈司天考〉、〈職方考〉、卷71〈十國世家年譜〉之序，頁669-746、873-884。

⁴⁸ 王安石，〈祭歐陽文忠公文〉，《臨川先生文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正編，1979年11月)，卷86，頁538。

⁴⁹ 《歐集》，卷3《居士集》卷3，頁62。

⁵⁰ 梅堯臣，〈和歐陽永叔啼鳥十八韻〉，《宛陵先生集》(台北：台灣商

風格有了明顯的轉變，環繞滁州醉翁亭、豐樂亭的作品正是最好的寫照。⁵¹又如仁宗嘉祐三年(1058)，歐陽脩權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⁵²前引蘇洵〈上歐陽內翰第一書〉作於仁宗嘉祐元年(1056)，⁵³正在權知開封府前二年，此時歐公文章已是「條達疏暢，無所間斷。……容與間易，無艱難勞苦之態。」則其性情能完全融入文章，臻於美善化境。

蘇軾既繼承又發展了歐陽脩的文學風格。將歐文之「平易」轉為蘇文之「多變化」，可說是北宋散文看到的一大分野，也可以說歐、蘇之間發生了「古文的變質」。⁵⁴有待深究的是，這些寫作技巧的轉變，重要的原因是什麼？蘇軾曾說自己「受性剛褊，黑白分明，難以處眾」，⁵⁵但在政治改革方面，他主張「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⁵⁶和歐陽脩一樣採取比較溫和的態度。後世史家給予蘇軾的評論意見是：「器識之閎偉，議論之卓犖，文

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正編，1979年11月），卷27，頁231。

⁵¹ 參見歐陽脩，〈豐樂亭記〉、〈醉翁亭記〉，出處同註40、〈遊琅琊山〉、〈豐樂亭小飲〉、〈琅琊山六題〉，出自《歐集》，卷3《居士集》卷3，頁62-63、67、68、〈豐樂亭遊春三首〉，出自《歐集》，卷11《居士集》卷11，頁114、〈題滁州醉翁亭〉，出自《歐集》，卷53《居士外集》卷3，頁396-397等。

⁵² 脫脫，《宋史》（台北：鼎文書局，1978年9月），卷319，列傳78〈歐陽脩傳〉，頁10378。

⁵³ 據洪本健，《宋文六大家活動編年》（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年12月），頁129。

⁵⁴ 何寄澎(1950-)《北宋的古文運動》說：「北宋古文運動發展到歐陽脩，已漸有重文傾向，在此以前，道重於文，文是道的附庸；在此以後，文道等量，甚且文重於道，歐陽脩適居樞紐。歐陽本人仍能做到文道兼重，並且在道的方面也能謹守儒家之道，對佛老排擊不遺餘力。但這種情形到蘇軾手上幡然一變，蘇軾雖一方面注重儒家經世教民之道，一方面卻為文而文，道遂往往僅成門面裝點而已。不僅如此，蘇軾所謂道，頗軼儒家而入莊(周，？-約前275左右)、釋，與古文運動原先標榜的宗旨已大相逕庭。」（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2年8月），第5章第1節〈古文的變質〉，頁231-232。

⁵⁵ 蘇軾，〈論邊將隱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劄子〉，《蘇集》，卷29，頁834。

⁵⁶ 蘇軾，〈辯試館職策問劄子第二首〉，《蘇集》，卷27，頁791。

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爲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爲。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爲也。」⁵⁷ 這段話與前引蘇軾〈六一居士集敘〉⁵⁸ 評論歐公之言多麼神似！顯而易見的是，歐、蘇二人性情相近，而他們面對王安石變法的政局，也曾互相慰勉鼓勵，常常有相近的行事風格。因此自身性情因素不當是歐、蘇文風不同的主因。蘇軾文風的特殊性，實可能得自於個人貶官流落過程所帶來的空間版圖及其處世之道的啓示。

前人早已觀察到蘇軾文章的變化，有早年晚年的不同。正如朱弁《風月堂詩話》卷上載：「東坡文章，至黃州(1080—1084)以後，人莫能及，唯黃魯直詩時可以抗衡。晚年過海(1097)，則雖魯直亦瞠若乎其後矣。或謂東坡過海雖爲不幸，乃魯直之大不幸也。」⁵⁹ 吳可(約 1125 前後)《藏海詩話》載：「子由(蘇轍)曰：『東坡黃州以後文章，余遂不能追逐。』」⁶⁰ 這二則材料，說明蘇文日進一步，尤以黃州時期爲關鍵。考察神宗元豐二年(1079)，蘇軾因詩文有「謗訕新政罪」，即有名的「烏臺詩案」被捕入獄。雖經衆人營救出獄，貶爲黃州團練副使；此後自號「東坡居士」，徬徨於山水間，於《老》、《莊》、《易》、《論語》及佛禪中尋求解脫。⁶¹ 今人章培恆指出：「他把老(李耳，約前 571 左右—?)莊哲學從無限的時間和空間的立場看待人生的苦難與歡樂及世間是是非非的

⁵⁷ 脫脫，《宋史》，卷 338，列傳 97〈蘇軾傳〉，頁 10818—10819。

⁵⁸ 同註 8。

⁵⁹ 引自四川大學中文系唐宋文學研究室編，《蘇軾資料彙編》，上編 1，頁 332。

⁶⁰ 引自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上冊，頁 338。

⁶¹ 蘇軾〈黃州上文潞公書〉說：「到黃州，無所用心，輒復覃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蘇集》，卷 48，頁 1380。案，柳宗元〈送僧浩初序〉曾說：「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柳集》卷 25，頁 673—675)他的著眼點即在於儒家「動而時中」、「淡泊名利」，因此讀這些書有助於人生出處進退的思考。參見王基倫，〈《易》與柳宗元古文表現風格之關係析論〉(台北：《師大國文學報》第 31 期，2002 年 6 月)，頁 167—168。

觀照方法，與禪宗以『平常心』對待一切變故、順乎自然的生活態度結合起來，求得人心靈的平靜。當種種不幸襲來之時，他都以一種曠達的宏觀心理來對待，把這一切視為世間萬物流轉變化中的短暫現象；他不願以此自苦，……這種心理使他的文學創作削弱了激情的強度，但同時也要看到：這不僅是時代文化的產物，而且畢竟表現出在更為高遠的立場上觀照社會與人生、處理個人不幸遭遇的宏達情懷。」⁶²無怪乎黃州三年餘，東坡詞有〈卜算子〉（黃州定慧院寓居作）、〈西江月〉（世事一場大夢）、〈水龍吟〉（次韻章質夫楊花詞）、〈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哨徧〉、〈念奴嬌〉（赤壁懷古），東坡文有〈方山子傳〉、〈答李端叔書〉、〈赤壁賦〉、〈後赤壁賦〉、〈記承天夜游〉等名作，⁶³皆飽含思想深度，頗為後人稱頌。飽經憂患，深添閱歷，造成蘇文大幅度的成長，至晚年而不衰。秦觀於哲宗元祐元年(1086)作〈答傅彬老簡〉也說：

蘇氏之道，最深於性命自得之際，其次則器足以任重，
識足以致遠，至於議論文章，乃其與世周旋至粗者也。

⁶² 章培恆、駱玉明，《中國文學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3月），卷中，第5編第2章第6節1〈蘇軾的生平與個性〉，頁371。曾子魯〈簡述蘇軾對韓歐古文成就的繼承與發展〉也說：「蘇軾沒有從韓愈『自鳴不幸』、歐陽脩『窮而後工』的觀點出發，進一步揭示作家的身世、處境給作品所帶來的影響，而是從創作的本質著眼，把創作當作反映現實生活、抒發自己生活感受的一大快事。」收入中國蘇軾研究學會編，《中國第十屆蘇軾研討會論文集》（濟南：齊魯書社，1999年3月），頁306—319。

⁶³ 蘇軾，〈卜算子〉（黃州定慧院寓居作），出自蘇軾，《東坡樂府》（台北：廣文書局，1960年2月），卷2，頁9b、〈西江月〉（世事一場大夢），出自《東坡樂府》，卷1，頁29a、〈水龍吟〉（次韻章質夫楊花詞），出自《東坡樂府》，卷2，頁20、〈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出自《東坡樂府》，卷2，頁2a、〈哨徧〉，出自《東坡樂府》卷2，頁3b—4a、〈念奴嬌〉（赤壁懷古），出自《東坡樂府》卷2，頁5b—6a、〈方山子傳〉，出自《蘇集》，卷13，頁420—421、〈答李端叔書〉，出自《蘇集》，卷49，頁1432—1433、〈赤壁賦〉、〈後赤壁賦〉、〈記承天夜游〉，出處同註45。

閣下論蘇氏而其說止於文章，意欲尊蘇氏，適卑之耳。……閣下試贏數月之糧，謁二公於京師，不然，取其所著之書熟讀而精思之，以想見其人。⁶⁴

秦觀這段話作於蘇軾離開黃州後二年，已形容出蘇文勝境的由來。一方面針對世俗觀點有感而發，撇清了蘇氏兄弟只會作文的說法，從而抬高其學術地位；另一方面也說明了蘇氏兄弟(尤其是蘇軾)的成就不當止於文章，或者說文章的成就亦當來自「最深於性命自得之際」。黃州之後，蘇軾始終顛沛流離，雖一度回朝任職，而其後浪跡天涯，走遍大江南北的遭遇，只有少數人差可比擬。晚年流徙至儋州，自料死於南荒，親友痛哭送別，那刻骨銘心的感受，更難為外人體會。自少到老，伴隨著生命的曲折歷程，蘇文有其藝術層境的提升。呂思勉《宋代文學》說：

東坡文字，當分少年與晚年觀之。少年文字，如〈策略〉、〈策斷〉等，氣勢極盛，然體格多有未成處。姚姬傳(鼎)評其〈策略五〉云：「此篇立論極善，而文不免於冗長，此東坡少年體有未成處。」……晚年文字，則心手相忘，獨立千載。議論文字，如〈志林〉，敘事文字，如〈徐州上皇帝書〉是也。東坡自言少年文字極絢爛，晚乃歸於平淡，可謂自知其功候。又謂「吾文如萬斛源泉，不擇地而施。及其與山石曲折，則隨物賦形，有不可知者。」又曰：「文字無定形，惟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可謂能自道其晚年之勝境矣。⁶⁵

⁶⁴ 秦觀，《淮海集》(台北：台灣中華書局四部備要，1965年11月)，卷14，頁1a-1b。

⁶⁵ 呂思勉，《宋代文學》，第2章〈宋代之古文〉，頁17。其中稱引蘇軾的言論，〈策略〉有五篇，出自《蘇集》，卷8，頁226-240；〈策斷〉有三篇，出自《蘇集》，卷9，頁280-289；〈志林〉見於《東坡志林》(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5月)，頁1-122；〈徐州上皇帝書〉，出自《蘇集》，卷26，頁758-762。另引述「吾文如萬

四、文體書寫的思考方式

歐陽脩倡導宋代古文運動時，吸納了駢體文的長處，他主張「偶儷之文，苟合于理，未必為非」，⁶⁶也曾高度贊揚三蘇父子的四六文說：

往時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語及廣引故事，以銜博學，而不思述事不暢。近時文章變體，如蘇氏父子，以四六述敘，委曲精盡，不減古人。自學者變革為文，迨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遲久而後獲，實恐此後未有能繼者爾。自古異人間出，前後參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見之，豈不為幸哉！⁶⁷

這段話肯定三蘇父子四六文「委曲精盡」的成績，但也流露出歐陽脩對前人作法的不滿意，在於追求用語故事，忽視了述事暢達的功能。其實，歐、蘇皆能欣賞寫作四六文的佳妙處，吳充〈歐陽公行狀〉評論歐陽脩「文備眾體，變化開闔，因物命意，各極其工。」⁶⁸呂本中《童蒙詩訓》也評論蘇軾：「自古以來，語文章

斛源泉……」句，出自〈文說〉，同註 43；「文字無定形……」句，出自〈答謝民師推官書〉，同註 44。

⁶⁶ 歐陽脩，〈論尹師魯墓誌〉，《歐集》，卷 73《居士外集》卷 23，頁 545。

⁶⁷ 歐陽脩，〈蘇氏四六〉，《歐集》，卷 130《試筆》，頁 1008—1009。

⁶⁸ 吳充，〈歐陽公行狀〉，《歐集》，附錄卷 1，頁 1251。章培恆、駱玉明《中國文學史》對這段話解釋道：「指出了他的散文創作的一些主要特點，即第一，文體多樣，有各種類型的議論文、敘事及抒情散文；第二，兼采『古文』與駢文之長，根據內容需要熔鑄剪裁，形成新的散文風格；第三，變化多端，開闔自如，氣脈流動，富於內在節奏感與韻律感。」參見該書卷中，第 5 編第 2 章第 3 節〈歐陽

之妙，廣備眾體，出奇無窮者，唯東坡一人。」⁶⁹可見擅長寫作各類文體，是促成北宋古文運動成功的要素之一。

對此，宋人詩話有許多耐人尋味的討論。陳師道《後山詩話》說：

國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散語與故事爾。楊文公(億，974—1020)刀筆豪贍，體亦多變，而不脫唐末與五代之氣。又喜用古語，以切對為工，乃進士賦體爾。歐陽少師始以文體為對屬，又善敘事，不用故事陳言而文益高，次退之云。⁷⁰

唐末五代以來的文風，為楊億等人領導的西崑體所繼承，其特色為「喜用古語，以切對為工」，前者結合宋初士大夫「用散語與故事」的作法，造成好用僻典的現象；後者結合士大夫「例能四六」的作法，即追求詞采富麗、聲調鏗鏘。范仲淹〈尹師魯《河南集》序〉說：「洎楊大年(億)以應用之才獨步當世，學者刻詞鏤意，依稀彷彿，未暇及古也。其間甚者專事藻飾，破碎大雅，反謂古道不適用於，廢而弗學者久之。」⁷¹石介〈怪說中〉也說：「今楊億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浮巧侈麗，浮華纂組，剗鏤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離析聖人之意，蠹傷聖人之道……。」⁷²從他們的批判看來，楊億等人不是拒斥聖人之道，而是割裂經書詞句，斷章取義，專力於摘句用典，反而讓古道湮滅不彰。大致說來，西崑體用力於文辭者多，用心於思想內涵者少。

脩與詩文變革的完成》，頁 346。

⁶⁹ 引自四川大學中文系唐宋文學研究室編，《蘇軾資料彙編》，上編 1，頁 255。

⁷⁰ 引自何文煥編，《歷代詩話》，上冊，頁 310。

⁷¹ 范仲淹，〈尹師魯《河南集》序〉，《范文正公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正編，1979年11月)，卷 6，頁 53—54。

⁷² 石介，〈怪說中〉。引自郭紹虞編，《中國歷代文論選》(台北：木鐸出版社，1980年5月)，中冊，頁 19。

歐陽脩《六一詩話》充分肯定楊億、劉筠(子儀，約 1016 前後)的藝術成就，他曾說「蓋其雄文博學，筆力有餘，故無施而不可」，也認為「用故事」或「不用故事」皆不害為佳句。⁷³這裡顯示他能從寫作技巧的觀點，廣博學習各文體作法。《後山詩話》說歐公「始以文體為對屬，又善敘事」，說明他不是停留在「散語與故事」的層次，反而採用「對屬」和「敘事」的技巧，提升其寫作功力。例如「少游(秦觀)謂：〈醉翁亭記〉亦用賦體。」〈醉〉文對屬整齊，敘事條理井然，正是一例。⁷⁴歐陽脩擅長「敘事」，與他重視「事信言文」的文學主張遙相呼應。至於歐陽脩「不用故事陳言」，表明了他不願意走上「喜用古語」、好用僻典的路途，那些以「賦頌章奏」為主、有利於科考利器的西崑作品，歐陽脩不願多作。⁷⁵這樣的寫作方式，又與他的性情配合，形成獨特出眾的「平易」敘事風格。

此後不久，人們轉而看重蘇軾「議論」方面的長才。本來宋人就好議論，言事論政是很普遍的現象。周必大(1126—1204)〈蘇魏公文集後序〉說：「熙寧(1068—1077)元豐(1078—1085)，以經術相高尚，回視前日，不無疵之辨焉。再變而至元祐(1086—1093)，雖闢專門之學，開眾正之路，然議論不齊，由茲而起。又一變為紹聖(1094—1097)元符(1098—1100)，則勢有所激矣。」⁷⁶這說明了伴隨蘇軾一生的時光，是更為變本加厲的議論風氣，蘇軾這方面的成績出色，也有推波助瀾的功效。「荆公(王安石)以

⁷³ 引自何文煥編，《歷代詩話》，上冊，頁 270。

⁷⁴ 語出陳師道《後山詩話》。引自何文煥編，《歷代詩話》，上冊，頁 309。陳師道《後山詩話》又載：「世語云：『歐陽永叔不能賦。』」若認定〈醉翁亭記〉亦為賦體，則歐陽脩能賦，只是此類作品較少而已。引自何文煥編，《歷代詩話》，上冊，頁 312。

⁷⁵ 邵博，《邵氏聞見後錄》說：「本朝四六，以劉筠、楊大年為體，必謹守四字六字律令，故曰『四六』，然其敝類俳語可鄙。歐陽公深嫉之曰：『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脩所好。少為進士時不免作，自及第遂棄不作。』」卷 16，頁 1b。

⁷⁶ 周必大，〈蘇魏公文集後序〉，引自陶秋英編選，《宋金元文論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 年 11 月)，頁 280。

經術，東坡以議論」，⁷⁷ 這般說法看得出時人對蘇軾議論文的肯定。

王正德(約 1182 前後)《餘師錄》卷二說：

本朝自明道(1032—1033)景祐間，始以文學相高，故子瞻、師魯兄弟(洙，1001—1047；源，1005—1054)、歐陽永叔、梅聖俞為文，皆宗主六經，發為文采，脫去晚唐五代氣格，直造退之、子厚之閭奧，……天下學者，爭相矜尚，謂之古文。皆以不識其人，不習其文為深恥。……當時諸公為之倡卒楷模，風流漸漬之所成。故相距七八十年，長老之人，皆能傳誦以教人，其為澤也厚哉！⁷⁸

楊慶存《宋代散文研究》說：「這段文字至少有如下幾點值得注意：一是說明興起和發展的時間，即從明道初(1032)直到『七八十年』後(蘇軾逝世時)，二是指出了古文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和為文特點；三是描述了影響之大之廣之深。」⁷⁹ 這裡也看出古文運動日漸興盛，來自民間誦讀教化的力量不可小覷。歐陽脩初起領導古文運動時，文學家與道學家對峙為兩派，古文大盛以後，「歐蘇古文派」隱然成形；其後人數眾多，又可再分為文章派、經術派與議論派，而後再分為蘇門派、太學派與道學派。⁸⁰ 考察上述三階段的傳承與變遷，蘇軾無疑是北宋中晚期最具影響力的人物。據現存詩話資料看來，「東坡先生學術文章，忠言直節，不特士大夫

⁷⁷ 陳善，〈本朝文章亦三變〉，《捫蝨新話》(台北：藝文印書館百部叢書集成儒學警悟)，上集卷3，頁1a。

⁷⁸ 引自洪本健編，《歐陽脩資料彙編》，上冊，頁378。

⁷⁹ 楊慶存，《宋代散文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9月)，第6章第3節〈體派共生的多元復合群體：歐蘇古文派〉，頁133。

⁸⁰ 楊慶存，《宋代散文研究》，第6章第5節〈文章派、經術派與議論派〉、第6章第6節〈蘇門派、太學派與道學派〉，頁140—144、144—145。

所欽仰，而累朝聖主，寵遇皆厚。」⁸¹這也是他受到世人看重的一大原因。

五、結 論

歐、蘇二人天資聰穎，勤敏有功，同樣都能持守儒道傳統，寫作古文，獎掖後進，領導當代文風，接力完成宋代古文運動，影響深遠。更難得的是，二人性情相近，剛正敢言，發為議論，擲地有聲。歐陽脩多年在朝為官，仕途相對較為平順，性情也能和易清簡，加上「事信言文」的文學主張，抒發出平易近人的寫作風格。蘇軾雖然宦途險巇，促成晚年生命層境大不相同，但仍不願出之以激憤，文筆趨於純熟，超凡而脫俗。一常在朝，一常在野，而人品高潔，皆能樹立當代文士的典範。歐擅長敘事，蘇則跟隨文風的轉移，擅長議論；其實兼擅眾體寫作，原為二人追求的目標，只是較突出表現於某方面而已。今人郭預衡認為：「文章到北宋，又有新特徵。一是長於議論，二是平易自然。長於議論，是政治上積極的一種表現；平易自然，是藝術上成熟的一個標誌。」⁸²這正好說明歐、蘇各自不同的成就，但是歐也能議論，蘇也能平易，大作家原不拘限於一格。

從接受史的角度看來，歐陽脩「三十年後世上人更不道著我」的說法，並未出現。原因當在於歐陽脩散文的藝術成就亦佳，他也經過「由奇而常」的努力，確立了唐宋散文的分野。蘇軾的影響力確實與日俱增。這原因來自多方面：一是蘇軾自身的創作經

⁸¹ 陳巖肖(約 1138 前後)，《庚溪詩話》，引自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上冊，頁 170。其中所謂「累朝聖主」，包括神宗、哲宗、徽宗、孝宗等人。

⁸² 郭預衡，〈北宋文章的兩個特徵〉，《社會科學戰線》1985 年 3 期，頁 300—310。

歷，作品豐富，生命層境愈趨通透；二是他擴大了文學範圍的解釋，追求「意」的呈現，於是作品無施不可，給予當代文風良好的示範；三是仕宦遊歷，飄泊南北，既擴大了空間版圖，也受到朝廷皇帝的同情目光。下至市井小民，上至達官貴人，眾人都成了蘇文的讀者。

儘管如此，蘇軾大名終未掩蓋歐陽脩，歐、蘇二人也沒有競勝高下之爭，後世詩話、筆記少有評比。蘇軾始終尊歐，當為其中關鍵因素。這真是一對令人欽羨的師生，文名相得益彰，永垂不朽。